

健康的领袖造就健康的教会

文 / 朱利安·立德司通(Julyan Lidstone)

中文编译：Joseph Li 审订：思温格

撮要：作者在文中分析了独断型领袖与恩庇型领袖的利与弊，以及对教会造成的影响。作者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情况为例，提出教会领袖对于教会属灵生命的健康负有责任，以及最大的挑战是培养亲自接受十字架和恩典原则的领袖。作者认为领袖态度的转变是以他们自己的痛苦和耻辱为代价的，通过接受耻辱，并耐心等待翻转，他们展示出在神的国度中如何运用权柄。如果我们要建立健康的教会，我们也必须拥有属灵资源，在受到批评时保持沉默，在受到攻击时保持温柔，在被背叛时宽恕。当我们参与基督的苦难时，我们将同享圣灵的力量，赐予我们持久的果实。

关键词：独断型领袖 恩庇型领袖 健康的教会领袖

编译者按：朱利安和他的妻子在土耳其花了 15 年时间建立教会。回到苏格兰后，他做教会的传道人和外展牧师，并在那里工作了 4 年。过去 12 年以来，朱利安一直担任西亚和中亚机构的负责人。同时他们还参与了其所在城市面对伊朗人和土耳其人的事工。朱利安的著作，《放下紫袍：如何在阶级文化中从事仆人领导》，已翻译成中文，此书中文版链接：<https://shop.campus.org.tw/ProductDetails.aspx?productID=000582865>

本文翻译自《苗圃》期刊 (Seedbed Journal) 2014 年五月,第 28 卷,第 1 期, 43-49 页。中文版经作者及《苗圃》期刊同意翻译、转载。阅读英文原文请点击: <https://www.seedbedjournal.com/article/healthy-leaders-make-healthy-churches>, 免费申请订阅请点击: seedbedjournal.com.

难题：独断型领袖 (Authoritarian leaders)

20 世纪 80 年代末,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导致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一段显著的教会增长期。来自东欧和中亚的令人振奋的报告, 对我们这些一直为这些国家的穆斯林祷告的人来说, 是神对祷告的美妙答复。其中包括许多关于神奇治愈的报道, 也包括人们从死里复活的可靠记录。理查德·希伯特当时正在保加利亚讲土耳其语的穆斯林罗姆人中工作, 他写道: 到 1995 年, 一百个聚会点大约有 10,000 名信徒参加聚会 (2013, 315)。同样, 哈萨克斯坦东部的维吾尔族也对福音做出了回应, 资深工人和圣经翻译者约翰·史密斯¹ 报告说, 仅在一个省辖的城镇, 在当地牧师的带领下, 就有一百名新信徒参与聚会。

遗憾的是, 早期如此良好的势头未能保持, 如今前来聚会的会众数量明显下降。希伯特估计, 保加利亚的穆斯林罗姆人中现在只有 6,000 名信徒。而史密斯在发现 100 名维吾尔族信徒完全停止聚会时感到非常难过。这促使两人通过拜访仍在参加教会聚会的人和那些放弃的人来研究衰落的原因。希伯特的研究结果发表在《宣教学》(2013 年) 中, 史密斯的结论则记录在他的通讯中。他们研究的结果非常一致。

令人鼓舞的是, 两人都发现那些放弃教会的人并没有放弃耶稣。保加利亚只有一名受访者重回伊斯兰教, 而维吾尔人中没有一个人否认自己的基督信仰。一位已经 14 年没有去过教会的女士, 仍然声称自己强烈谴责耶和華见证人! 人们脱离了教会, 但并没有离弃信仰。

两人都指出了人们离开教会的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欠缺社群团契凝聚: 许多人受到恶意流言蜚语的困扰、有与他人无法解决的冲突或当他们无法保持外

1 来自个人通信。为保护身份, 使用化名。

界对他们期望的行为时所产生的羞耻感。宗教社会学家斯塔克和班布里奇观察到，世界各地的信徒流失都与未能形成令人满意的社群纽带有关（1996 年）。

然而，最重要的因素却是对领袖的抱怨。“离开者”认为牧师冷漠、专制、控制欲强、好胜，并经常通过排斥或公开羞辱来处理异议。约翰·史密斯观察到，许多维吾尔族离开者“对牧师的一系列随意言论感到愤怒”。

人们普遍认为，一个组织的领袖在其精神和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教会的持续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会领袖。穆斯林社会中新教会的领袖通常都是第一代信徒，因此他们对领导力和权柄的理解受到其母文化主流规范的影响。霍夫斯泰德等社会学家将亚洲和中东的大多数社会归类为高权力距离 (High power distance) 社会，这意味着领袖应该以冷漠和专横的姿态出现，并通过获得特权来维护自己的权柄（2005，57）。这些区域的文化是集体主义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这意味着羞耻和荣誉是行为的强大驱动力，控制着社会互动。

恩庇型领袖 (Patron Leaders)

在这样的社会中，领袖好像恩庇主，被领导的人好像侍从者。恩庇主具有强大的父亲形象，要照顾和供养他们的侍从者；作为回报，侍从者要以感激和赞美的方式忠诚地服从恩庇主。双方都很满意，因为恩庇主获得了荣誉，而侍从者则找到了安全感。这是等级森严的荣辱 (shame-honour) 社会中默认为的领导模式，虽然它可以是一种真正互惠互利的关系，但很容易被滥用。

人们普遍观察到，教会中恩庇 — 侍从 (Patron-Client) 领导模式存在潜在问题。这些领袖：

- 不能承认弱点：领袖认为他必须捍卫自己的权柄以维护自己的荣誉，因此不能承认任何弱点。他必须始终知道所有答案。
- 压制批评：任何批评都被视为对他权柄和荣誉的攻击，因此人们必须保持沉默。这导致了一种很难表达不同意见或报喜不报忧的文化。
- 以回避的方式惩戒：持不同意见者和批评者会受到羞辱的惩罚，这意味着领袖可能会回避他们，甚至公开羞辱他们。

- 将新领导人视为威胁：新兴领导人被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因此不能授予他们权力。这通常会导致有天赋的年轻人与领袖发生激烈争吵，并带走他的朋友去建立新教会。

- 与其他领导人竞争：其他教会的领导人也被视为对领导人地位的威胁，因此有必要通过批评来打压他们。

- 倦怠：若一个人需要承担无限的责任、并经常遇到不可避免的冲突，这样的禾场环境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负担，结果许多人就会陷入沮丧或罪恶。

虽然从韩国到巴西，许多等级森严社会的教会都出现了这些症状，但伊斯兰教认为独裁的上帝是遥远、反复无常和具有威胁性的，这种观点可能强化了穆斯林社会中有害的领导倾向。这意味着这些社会中的新教会将遭受更多这些弊病的困扰。

我是英国人，这意味着我倾向于个人主义，对权威人物持怀疑态度。我非常清楚这些领袖的弱点，并对他们专横跋扈和粗暴的行为感到反感。我本能地想用西方当前的民主、赋权和促进型领导模式来挑战他们。然而，我知道，这样做是在宣称我的文化框架的优越性，而我无法为之辩护。我若邀请他们采用一种与他们文化格格不入的领导风格，他们无法实施这种风格，而且这种风格会给他们的追随者带来困惑。

保罗对家长型领袖的态度

圣经是否提供了一种挑战东方与西方对领导力和权柄的看法呢？是的确实如此！耶稣和保罗在滥用恩庇型领袖权柄的文化中成功地发挥了领导作用，并且颠覆了人们对权柄的普遍理解，也展示了领导力在神国中如何发挥作用。

公元一世纪的社会等级森严，为荣誉而展开永无止境的竞争。安德鲁·克拉克 (Andrew Clarke) 的《哥林多的世俗和基督教领导》(Secular and Christian Leadership in Corinth)(1993) 将社会描述为等级森严的社会，领袖拥有近乎绝对的权力。在社会的最高层，凯撒被赋予了神圣的地位，在家庭层面，父亲可以对他的奴隶，甚至自己的孩子行使生杀之权。对每个人来说，追求荣誉是最高价值，据记载，亚历山大大帝之所以能功成名就，是因为他渴望被“全世界的人所认识和尊敬”。

人们争相获得铭文中记载的头衔,或者在专业修辞学家的演讲中受到赞扬。宴请、婚姻合同甚至商业交易的目的都是让别人承担义务,从而提升自己的地位。荣誉被视为有限的,因此羞辱对手是提高声誉的重要方式;事实上,法庭案件与其说是一种确定有罪或无罪的机制,不如说是一种羞辱敌人的机制。

哥林多前书

克拉克 (Clarke) 和其他人指出文化背景对哥林多教会的影响有多么深刻。泰森 (Theissen) 指出,革来氏家所报告的分裂 (林前 1:11) 可能是由于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摩擦造成的,这一点在对滥用圣餐的丑闻中表现得非常清楚 (1982,154)。按照世俗行会聚餐的惯例,富有的来宾会先吃,并且吃得更多,以此来炫耀自己的地位,羞辱那些地位较低的弟兄 (林前 11:22)。这些精英喜爱亚波罗婉转、优雅的言辞,他所表现出的世故也正合他们的口味。他们对保罗拒绝依靠人的“智慧和口才”感到反感,担心保罗可能会使十字架信息失去能力 (林前 1:17)。

保罗对向他权柄发起攻击的回应,并非诉诸与对方在言辞上针锋相对,而是以自己的受辱为荣,扮演一个被鄙视的傻瓜的角色,愿意成为世上的渣滓 (林前 4:8-13)。皮克特表明,钉十字架是奴隶所受的终极羞辱,保罗以基督的十字架为榜样,推翻了所有社会习俗 (1997, 77)。这样做并没有削弱保罗的属灵权威,因为他继续以哥林多人的属灵之父的身份劝诫他们,并直言他有权柄使用“惩戒杖” (林前 4:21)。

哥林多后书

然而,这一策略并没有立即取得成功,保罗与哥林多人的关系继续使他深感悲痛。巴内特重新梳理了保罗与哥林多人的关系,认为在一次痛苦的拜访之后,保罗“含泪”写了一封信 (林后 2:1-4),这封信促成了许多人的悔改,这让他非常高兴 (林后 7:16),但他仍然不得不与假使徒及其朋友打交道 (2011, 234)。

在这封书信的字里行间中,我们可以发现假使徒们对保罗反感的深层原因,是因为保罗拒绝遵守当时的“荣誉”规范:

- 他“气貌不扬，言语粗俗”（林后 10:10）。而人们所期望的领袖须具备充满活力的个性，并且是有影响力的演说家。亚历山大是他们喜欢的榜样，而非拿撒勒人耶稣。

- 他不接受经济资助，因为他靠手工谋生（林后 11:7）。没有一个高傲的哲学家或教师会用手工劳动来贬低自己。此外，拒绝他们的支持意味着拒绝他们的赞助。保罗拒绝出卖自己，以损害他的事工。

- 他熟知旧约圣经，认为自夸是愚昧之举（林后 11:18 例如诗 75:4）。自夸是公元一世纪追求荣誉的必经之路，精英阶层会炫耀自己的地位、财富和成就。

- 他太软弱了，无法剥削别人或打他们的脸（林后 11:20）。“超级使徒”和他们的同伴显然更深谙世俗的领导和权柄，这使他们有权利驱使并管制下属。他们的属下则仰望强大的领袖，并期望受到他们的管制。

保罗不情愿地接受了他们夸耀自己的事实，但他却以高超的技巧挫败了他们的骄傲。他夸耀自己所受的苦难，这些苦难使他留下像奴隶一样被鞭打的伤疤的耻辱（林后 11:23）。他谈论自己的功绩，但讲述用筐子逃脱的故事却使他显得很愚蠢（林后 11:33）。他也曾有过强大的圣灵体验，但他又自嘲他的祷告甚至无法治愈自己（林后 12:8）。他夸耀自己的软弱，因为在他的软弱中，神的能力显得完全。

第 13 章记录了神的能力如何在保罗的软弱中显现，因为保罗现在明确表示，他带着权柄来对付罪人，希望造就他们，但也准备好可能摧毁他们（林后 13:10）。罗马书 15:26-27 表明他是如何成功完成使命的，因为亚该亚的圣徒们支持保罗向耶路撒冷的穷人送捐献的计划，并“乐意凑出捐项”。保罗用以击败哥林多精英和假使徒挑战的方法，并不是诉诸自夸和炫耀的策略，而是通过坚持效仿他的主，承担被钉十字架的卑微且耻辱的角色，颠覆了他们的世界观。

今天的应用

教会领袖对于教会属灵生命的健康负有责任。在哥林多教会，“革来氏家里的人”（林前 1:11）所报告的分裂是新生教会主要的领袖对权柄的等级观念造成的。今天我们看到，专横的领袖在最好的情况下限制教会的发展，在最坏的情况下导致冲突，进而使许多人感到失望和跌倒。哥林多教会的领袖曾受过保罗的教

导，而我们这些寻求在穆斯林世界培育新信仰社区的人也将面临同样的情况。我们最大的挑战是培养亲自接受十字架和恩典原则的领袖。

然而，保罗发现挑战现行的领导模式会引发冲突和敌意。即使是他的朋友似乎也对他未能满足他们的期望而感到失望，并转而反对他。他们嘲笑和羞辱带领他们信仰的人，使他经历了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林后 4:7-12）。他们欢迎那些带来诱人的但却有毒的福音解释的假使徒。犹大对耶稣做了同样的事情，今天我们的许多同事也有类似的见证。

当然，如今许多西方人之所以遭遇这些危机，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文化缺陷。他们对恩庇——侍从关系的理解有限，对他人感受的不敏锐，使他们与当地信徒的关系破裂。然而，尽管耶稣和保罗作为局内人了解他们的文化，并拥有非凡的修辞技巧来传达他们的信息，他们仍然遭受背叛和拒绝。

虽然教导对于改变这种心态至关重要，但却很难改变根深蒂固的态度。单靠文本信息无法改变人心。在听了耶稣三年的讲道之后，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夜，门徒们仍在争论谁是最大的（路 22:24）。这种范式转变需要深刻的个人危机，而这种危机足以引发对价值观和基本世界观的质疑。耶稣的门徒们因主为他们洗脚，然后屈服于十字架的羞辱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我相信保罗在林后 11:21-12:10 中的“夸耀”也成功地揭露和颠覆了主流文化的规范。

我观察到，人们在失败时最容易接受这种变革性的学习。我认识的几位中东教会领袖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成熟，从他们早期事工中的冲突和分裂中吸取了教训。他们学会了不被年轻领袖威胁，为同僚领袖的成功而高兴，接受追随者的批评而不以排斥和羞辱来回应。这些领袖的导师的作用是把沮丧的时刻变为成长的机会。

对于耶稣和保罗来说，领袖态度的转变是以他们自己的痛苦和耻辱为代价的。通过接受耻辱，并耐心等待翻转，他们展示了在神的国度中如何运用权柄。通过亲自示范一种激进的反文化领导风格，他们能够看到其他人开始以同样的精神来传道。如果我们要建立健康的教会，我们也必须拥有属灵资源，在受到批评时保持沉默，在受到攻击时保持温柔，在被背叛时宽恕。当我们参与基督的苦难时，我们将同享圣灵的力量，赐予我们持久的果实。●

参考书目

- 巴内特 · 保罗。2011 年。《哥林多问题》。诺丁汉：阿波罗出版社。
- 克拉克 · 安德鲁。1993 年。《科林斯的世俗与基督教领导》。莱顿:布里尔。
- 希伯特 · 理查德。2013 年。《他们为什么离开? 》宣教学 41:315-328
- Hofstede, Geert 和 Gert Jan Hofstede。2005。文化与组织：思维软件。纽约：McGraw Hill。
- 皮克特 · 雷蒙德。1977 年。《哥林多的十字架：耶稣之死的社会意义》。谢菲尔德：谢菲尔德学术出版社。
- Stark, Rodney & William Bainbridge。1996 年。《宗教理论》。新不伦瑞克：罗格斯大学出版社。
- Theissen, Gerd。1982 年。《保罗基督教的社会背景》。爱丁堡：T&T Clark。